

学科、学术、学人 的薪火相传

XUEKE XUESHU XUEREN DE
XINHUO XIANGCHUAN

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文集

SHOUJIE ZHONGGUO RENLEIXUE MINZUXUE
ZHONGQINGNIAN XUEZHE GAOJI YANXIUBAN WENJI

谭志松 黄忠彩 主编

民族出版社

Q98-532
2013/

阅览

学科、学术、学人 的薪火相传

XUEKE XUESHU XUEREN DE
XINHUO XIANG CHUAN

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文集

SHOUJIE ZHONGGUO RENLEIXUE MINZUXUE
ZHONGQINGNIAN XUEZHE GAOJI YANXIUBAN WENJI

谭志松 黄忠彩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科、学术、学人的薪火相传：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文集 / 谭志松，黄忠彩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10

ISBN 978 - 7 - 105 - 12429 - 9

I . ①学… II . ①谭… ②黄… III . ①人类学—文集
②民族学—文集 IV . ①Q98 - 53 ②C9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4442 号

策划编辑：杨 青

责任编辑：唐海琴

封面设计：金 眯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9

定 价：5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429 - 9 / C · 340 (汉 875)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编辑委员会

顾问：周明甫 李建林
主编：谭志松 黄忠彩
副主编：黄柏权 田 敏 田 阡 刘 谦
成员：田 强 王东昕 谢国先 冯雪红
王作新 陈廷亮 邓莹辉 宋仕平
朱祥贵 李忠斌 鲁建彪 邓辉煌
董绍春 吴正彪 瞿州莲 李 锦
刘冰清 岳小国

序

2011年11月8—15日，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办、三峡大学承办的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在世界水电之都、三峡工程所在地、全国文明城市——湖北宜昌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三峡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北民族学院、重庆三峡学院，以及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湖北省民族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位中青年学者（50岁以下，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研修班的学习。

举办此次研修班的目的是：为培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领军人才提供平台，服务于国家的学科建设，推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水平和学科国际对话水平与能力的提高，促进民族团结与繁荣。研修班活动主要分为专题演讲、研修学员交流研讨和学术考察三个部分。先后邀请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一副主席萨黑拉（Soheila shahshahani）教授作了题为*Anthropology, a Critical and Relevant Field in Today's World*，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委员、伦敦大学汤姆（Selwyn Christopher Thomas）教授作了题为*Tourism, Power, and Pleasure: The Scope of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Tourism*，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秘书长、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郝时远教授作了题为《民族问题：世界与中国》，北京大学马戎教授作了题为《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作了题为《农民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五个专题的演讲。各位专家围绕演讲主题对

当今世界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界所关心的相关热点、重点、学科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讲解，并与学员展开了热烈地互动、讨论。

在此次研修班上，中青年学者们所提交的论文富有洞见、涉猎广泛，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学科构建；既有田野调查成果，也有民族史研究。此外，还有旅游人类学、少数民族法学、农民工群体，以及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探讨，可谓主题多样，精彩纷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在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比较前沿的领域，比如关于动物行为学与行为人类学等研究也受到了研修学员的关注。各位学者新秀提交的论文，令我对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学术以及学人的未来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从我们研修班里一定能够诞生出一批我国重量级甚至大师级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由此也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本届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了记录这一届研修班的丰硕成果，研究会决定由我和秘书长黄忠彩同志主编出版研修班文集。我们从研修班学员提交的论文中遴选出 19 篇结集成册，以题为“学科、学术、学人的薪火相传：中国首届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文集”出版，让这些中青年学者的研修心得广泛交流，以飨国内外广大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尊重作者，审稿时除了一些明显问题提出要作者或审稿人直接修改外，主要尊重原文，本着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供学者们讨论！

我，作为研究会指派的本届研修班的“班主任”、承办研修班的具体负责人，还要借此文集出版之机，特别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明甫先生亲临开班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不仅对研修班及研修学员提出了具体要求，指明了方向，而且提出了一些对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学术观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黄忠彩副主任，自始至终参与了研修班所有活动，出席研修班结业典礼，为学员颁发研修结业证书并作总结讲话；湖北省民宗委副巡视员郑隆贵同志专程出席开班典礼并致辞；三峡大学在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李建林书记出席开班典礼并致辞。以上各位领导的直接关怀和指导是首届研修班顺利开展且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还要感谢三峡大学社会科学处田强副处长、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黄柏权院长、王作新书记、谢国先教授、岳小国博士、黄丽博士、黄权生博士、曹大明博士、杨超博士、陈廷

亮博士以及王显锋、袁波澜、李彬老师等，他们为研修班和论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特别是岳小国博士通读和审阅了所有论文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研修班学员西南大学田阡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刘谦博士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分别作为研修班的班长和副班长，热情奉献、细致工作，把研修班各项活动组织得充实而活跃，还率领全班学员向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发出以“凝聚、奋进、发展”为主题的倡议书。我不仅为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学识水平感佩，而且为他们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而感动！至此，也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我还想就举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谈点自己的想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决定通过举办高级研修班的形式，为培养新一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带头人提供平台和创造条件，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样一种形式需要得到学界，特别是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使它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主持下继续下去，并不断完善和提高！我们承办首届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只是做了一次初步的探索，取得一些初步的经验。如何进一步办好“高级研修班”，还需要研究会和后面的承办单位总结经验、开拓思路、大胆改革，使研修班的内容更丰富、成果更丰硕。我们期望并相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必将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学术、学人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之一，必将为促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谭志松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三峡
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年5月11日于宜昌

目 录

第一篇 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族群理论及其在我国应用的反思	陈心林	3
关于创建儒学的若干问题思考	鲁建彪	14
20世纪前半叶云南边政学研究述评	高志英	30
F. 德瓦尔论人猿关系及人在动物界的位置	赵羊里	49
浅析现阶段“民族融合”观点的社会影响	肖 锐	68

第二篇 人类学田野调查

土家族摆手的地域性差异研究	刘冰清 彭林绪	87
维吾尔族妇女婚姻观镜像 ——基于新疆喀什地区 S 县阿村的调查	冯雪红	101
散居区朝汉双语教育的人类学调查与思考	崔英锦	115
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与社会资本研究 ——以深圳攸县籍出租车司机为个案	田 斡	123
“特色”的生成：赣南畲族族群认同下的文化实践 ——以南康赤土畲族乡近年来的建筑表现为中心	曹大明	139

湖南维吾尔族调查报告.....	黄丽	148
宜昌黄柏河流域人类学（历史学）考察	黄权生 罗美洁	159

第三篇 民族史研究

也论土司制

——人类学视域下的国家、地方关系研究.....	岳小国 陈红	185
论清政府开发对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以改土归流后永顺府辖区为例.....	瞿州莲	201

第四篇 应用人类学研究及其他

民族旅游的困惑与选择：经济与文化能否双赢

——关于中国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反思	田敏	221
实现心中的图像		
——试析家庭教育应对学校教育的途径与机理	刘谦	234
商务活动中的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杨超	261
民族学和人类学翻译中的译名问题与译者修辞权力.....	谢国先	269
国学传播与首都社会建设间的关系探究.....	冯跃	283

第一篇

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族群理论及其在我国应用的反思

陈心林

(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陆学术气氛的活跃，基于对民族理论的商榷，族群理论逐渐被引介进来，^①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热点。然而，在我国族群研究蔚为大观的表象背后，却凸显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其原因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不乏主观的误解甚至误导。这些问题既妨碍了学术研究的“求真”，也妨害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善治”。本文不揣仄陋，对族群理论的缺失以及我国族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敬请指正。

一、族群理论的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使得它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族群理论是一种生发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理论，就其本源上看，它试图说明的主要也是西方社会的人群分类模式和关系格局。族群理论在西

^① 据郝时远先生考证，祖国大陆学界最早使用“族群”一词的例子是费孝通先生1981年在其著作中将“中国的民族识别”翻译为“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China”。见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载《思想战线》，2002（5）。

方兴起时，其社会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正向现代化迈进，与之相伴随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是某些族群的退步、萎缩以及族群间的冲突。族群研究即是为谋求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作出的探索，其研究的对象一般是“那些在人口和国家政治上居绝对劣势的非主体民族”^①，与主体族群一般有着较大的经济、文化甚至种族差异，如美国族群研究通常的对象是亚裔、非裔美国人以及印第安人等，其研究也多关注族群间的竞争，而对族群间可能存在的共生、合作关注不够。^② 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中，“ethnic group”或“ethnicity”都具有“非常强烈和惯常的‘差异’或‘他者’等性质的偏见”^③。此外，西方的族群研究多集中在城市社区和移民群体，随着“二战”以后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这一趋势愈加明显。

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族群关系格局和西方有着相当的差异。我国传统的族群观主要是依据文化上的差异而非种族、血缘的区别来区分我族与他族。^④ 族群的边界是柔和、可变的——我族和他族、主体民族和边缘民族之间都可以互为进退、相互转化，如学者所指出的：“‘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华夷之辩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⑤ 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也指出：“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中国早先的皇帝宣称他们统治着所有文明的人类，而不管其种族或语言的差别如何。……一个人只要他熟悉经书并

^① 范可：《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4）。

^②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2）。

^③ Elisabeth Tonkin, Mart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1989,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p. 14.

^④ 类似表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处处可见，此处仅举一例。陈寅恪先生在其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及魏晋以后中华民族各族群融合、互动的情形，认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或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7~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⑤ 张磊、孔庆榕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学》，28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① 我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也不过于强调主权的观念，与西欧的民族—国家传统有很大不同。从现状来看，我国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远的农村，且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生计方式还是以农业、畜牧业或渔业为主，现代化的道路漫长而不无艰难，“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许多小而分散的群体在族群运动中联合起来。这些运动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在这样的社会中族群认同不再像以往那样与地方社区发生密切联系”^②。更为重要的是，自1949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对少数民族予以优惠政策，民族“法律上的平等”已基本实现，这与西方国家强调“个体平等”的传统有很大不同，也使得我国的族群关系与西方有很大不同。

郝时远先生通过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ethnic group”术语的实证分析指出，传统的“ethnic”与“race”的重叠含义是显著的，基于种族、祖籍国（来源地）的移民群体是“ethnic group”术语确指的主要对象，而且在应用中通常主要用于所谓“有色人种”，这与欧美国家属于种族人口混杂程度极高的国情特点直接相关。^③ 中华民族在种族分类上主要属于蒙古人种，种族混杂程度较低，各族群之间体质差异不大，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彼此之间交流频繁、联系紧密，与欧美国家的状况有着明显的差异。

更令人警醒的是，郝先生指出，“ethnic group”概念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能在西方知识界、社会大众中取得话语权，是与这一时期美、英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美、英等传统宗主国与其原殖民地人民的关系十分紧张，冲突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在这些发达国家内部，种族冲突、社会矛盾也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西方国家内部也进入了政治运动、文化革命和社会裂变高潮迭起的时期”，“族类政治化”的现象十分

^①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9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② [美]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5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③ 郝时远：《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 ethnic group 的实证分析》，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 (4)。

突出。^① 我国的情况与此显然有很大的区别，从历史上看，我国没有形成以西欧国家为典型的“民族—国家”传统，各族群基本上没有形成各自的政治、疆域诉求，一般皆以中国、华夏为自己的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更是如此，族类政治化的问题从来没有形成（“藏独”、“东突”分裂势力只是相关族群极少数分子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的极端行为，没有成为族群动员的基础和可能）。

族群理论作为一种生发于西方社会和学术土壤的概念，在运用于中国实际时，必然要面临一个检验和修正的问题，而由于中国社会和文明发展历程的独特性，“任何以其他地区民族志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理论，要通过普同有效性的考验，以中国的材料进行验证，通常都是最艰难的一关”^②。菅志翔女士对西方民族理论的反思也值得重视，她指出：“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内的西方民族理论，其研究对象都是欧美社会以及传统文明不发达的殖民地社会，没有或者缺乏针对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古老文明的深入研究，严格意义上讲，他们的理论都是针对某种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民族志’，其适用性尚有待确定。”^③

二、警惕族群研究的政治化倾向——台湾族群政治的弊端

社会科学的理论必然会受到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的影响甚至制约，成为社会力量操控的工具，族群理论也不例外。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族群认同也是社会构建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它丝毫不亚于民族认同。所有的族群认同在某些程度上都是运用权力的结果，并且是从多样性

^① 郝时远：《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中的“认同群体”与 ethnic group》，载《世界民族》，2002（4）。

^② 何翠萍、蒋斌：《导论》，见蒋斌、何翠萍编：《国家、市场与脉络化的族群》，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3。

^③ 菅志翔：《“族群”：社会群体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工具》，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5）。

的文化资源中创造出来的。”^①就目前我国学界研究现状而言，多数学者认为族群是文化性的人群分类模式，而民族则是政治性的人群分类模式，进而基于强化国家一体性和培育公民性的考虑，主张用文化性的族群分类渐进地取代政治性的民族分类。其实，尽管族群主要是基于文化特征对人群作的区分，但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它却常常附着了浓厚的政治动机，成为政治操控的工具。族群冲突往往是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变体或者延续，相关各方常常以“族群”作为工具来凝聚自我、区分异己，以取得竞争优势。如白鲁恂（Lucian W. Pye）所指出的：“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②郝时远先生详尽论述了“ethnic”一词的政治属性，提醒我们一定不要“为西方人类学家将政治转喻为文化的倾向所误导”^③。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台湾的族群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警醒的例证。族群理论在台湾已被“泛政治化”，成为党同伐异、撕裂族群、制造“台独”的利器，诚如徐晓萍所言：“族群概念一经在台湾应用就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话语，各政党都不遗余力地打‘族群’牌，从而形成了台湾社会特有的、至今对台湾以及祖国统一事业贻害不浅的‘族群政治’。”^④

郝时远先生对台湾的“族群政治”作了深入、详尽的剖析。^⑤20世纪50年代初，族群（ethnic group）一词开始为台湾民族学界使用，到70年代，族群理论日益为其他相关学科关注、采接，进而为“台独”势力利用，成为依托于“省籍矛盾”构建“政治族群”和操控“族群政治”的基本话语，由此挑起“国家认同”层面上的“统独争议”，彰显了分化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3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

^② 白鲁恂（Lucian W. Pye）：《序·族群认同的先知》，见[美] Harold R. Isaacs著，邓伯宸译：《族群：集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

^③ 如 ethnic conflict（族裔冲突）、ethnic violence（族裔暴力）、ethnic resistance（族裔反抗）、ethnic prejudice（族裔偏见/种族歧视）、ethnic cleansing（种族清洗）、ethnic war（族裔战争）、ethnic politics（族裔政治）、ethnic nationalism（族裔民族主义）、ethnocentrism（族裔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等。见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载《思想战线》，2002（5）。

^④ 徐晓萍：《台湾族群问题与“台独”势力的政治利用》，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6）。

^⑤ 郝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2）。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郝时远先生的这篇大作。

民众、分裂中国的作用。1986年台湾第一个本土性反对党——民进党成立后，“一场以‘本土化’、‘台湾化’为主题的政治运动，夹杂着民主意识与分离主义意识席卷台湾社会”^①。李登辉执政后致力于台湾的“本土化、在地化”，在此期间，“台独”势力在台湾渐具声势，民进党分裂中国的活动也甚嚣尘上。按照族群理论的划分标准，台湾“应该只有汉民族和台湾原住民两大族群”^②。但是，由于台湾政治多元化和“台独”势力利用省籍、方言等因素对汉族群体进行的“认同政治”分化，形成了台湾的所谓“四大族群”^③格局：原住民族群、闽南人族群、客家人族群、外省人族群。台湾所谓“四大族群”的分类并不是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族群”划分，“是十分人为的、有特殊时空、特定政治含义的”族群分类。^④这种“族群认同”的形成，“需要政治动员的社会工程”^⑤，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正是这种社会工程的操纵者，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多元政治消解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进而将民主化、多元化导引为“去中国化”的“台湾国”认同。显而易见，“台湾社会的‘族群化’是表现在国家认同层面的分裂政治产物”。

总之，族群问题虽然不是确定台湾社会政治走向的决定因素，但却是台湾政治冲突在社会层面的延伸。“‘族群’是政治冲突过程中的一个创造，是用来进行政治权力支配、不同社会组织方式与意识形态系统抗争时利用的一个文化发明。”^⑥尽管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与台湾完全不同，“族群政治”没有存在的空间，加之各民族在历史文化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在生存场域方面又不似台湾各族群囿于一岛之地因而充满竞争与挤

^① 刘国深：《台湾“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分析》，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3）。

^② 杨仁煌：《谈文化与族群关系》，见洪泉湖等编：《族群教育与族群关系》，337页，台北，时英出版社，1997。

^③ 从文化差异上看，“四大族群”中除“原住民”与汉族之间存在原生性差异之外，“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都是汉族的支系，只是在方言、习俗上存在某些差异，并非民族文化层面上的差异。

^④ 张茂桂：《台湾的政治转型与政治的“族群化”过程》，见施正锋编：《族群政治与政策》，4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

^⑤ 吴乃德：《搜寻台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载《台湾政治学刊》创刊号，36页，1996年7月。

^⑥ 张茂桂：《台湾的政治转型与政治的“族群化”过程》，见施正锋编：《族群政治与政策》，42页，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